



- 戴维·M. 兰普顿
新型大国关系:寻求中美关系的长远基础
- 安德鲁·斯科贝尔
中美军事合作关系:我们如何共舞
- 由冀
解析中国应对海洋主权争端的政策和战略
- 江瑞平
全面推进的中国周边经济外交

外交观察

FOREIGN AFFAIRS OBSERVER

21 世纪的新型大国关系

主编 陈志实 | 副主编 韩 雪

- 刘军
俄美关系发展演变及其对中国外交环境的影响
- 成晓河
利益交换的失衡:中苏同盟解体的根源探析
- 樊吉社 张金勇
美日核关系的现状与未来
- 潘亚玲
战略区间设置:美国应对霸权衰落战略选择
- 李小鹿
阿富汗局势的未来走向及对中国的影响
- 毕洪业
俄罗斯与格鲁吉亚关系的困境及前景
- 美国亚洲研究局
2014年亚太观察

第 3 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外交觀察

FOREIGN AFFAIRS OBSERVER

21 世紀的新型大國關係

主編 陳志實 | 副主編 韓 雪

第 3 輯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外交观察. 第3辑, 21世纪的新型大国关系/陈志实主编.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 3
ISBN 978-7-5097-5547-1

I. ①外… II. ①陈… III. ①国际关系-研究 IV. ①D81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318482号

外交观察(第3辑) ——21世纪的新型大国关系

主 编 / 陈志实
副 主 编 / 韩 雪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3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皮书出版分社 (010) 59367127 责任编辑 / 陈 帅 王 颖
电子信箱 / pishubu@ssap.cn 责任校对 / 李 俊
项目统筹 / 邓泳红 责任印制 / 岳 阳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北京季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14
版 次 / 2014年3月第1版 字 数 / 178千字
印 次 / 2014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5547-1
定 价 / 49.00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外交观察》编辑委员会

学术顾问（按姓氏笔画排序）

于 滨 赵进军 黄 靖 傅梦孜

主 编 陈志实

副 主 编 韩 雪

编 辑 段修健 张 杞

编 务 简 单

支持单位 外交学院 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

网 站 [www. faobserver. com](http://www.faobserver.com)

卷首语

“小伙伴”是2013年中国网络社交媒体的一个热词。拟定本刊物主题之时，有人开玩笑：“不如就叫‘中国和她的小伙伴们’吧。”

诚然，伙伴关系是国家间关系状态的一种较理想选择——尽管目前很难成为常态。即将过去的这一年，中国和周边邻居间一度尖锐的领土争端暂时表现平静，中国国家领导人和诸多“远亲近邻”走动活跃。仅从表象看来，中国与它的这些“小伙伴们”目前相处还算融洽，领导人“串门”的收效不错。这些外交走访不乏新的战略、政策，也能将中国新一届领导班子的外交原则与风格窥得一二，但整体印象大抵在人们的意料范围之内。

在这一年的元首出访中，让各界觉得眼前一亮的是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的出场，特别是包括大批网民在内的国内舆论称其为中国“第一夫人外交”。尽管在当前中国国家制度和外交架构中，彭丽媛这番“夫人外交”举动的行动空间和实际作用还需进一步观察，但在外界看来，这与很多国家的第一夫人的形象和影响相近，似乎在表明中国正越来越向世界靠近。过去，如何在同一语境中对话一直困扰着中国。用对方熟悉且能接受的方式发声、行事，是中国外交必须重视的问题。

外交、国际关系等领域的学术研究也是同样。我们需要真正懂对方，进而清楚如何应对。相关研究不要再陷入“复杂”“多变”“重要”等老套路，减少动辄“挑战与机遇并存”的简单判断。言之有物、能让人看懂是学术文章的起码要求，同时，文章也需要融入学术研究的国际语境，不再“自说自话”，这是我们想为之努力的。

另外，要对各位读者说声抱歉，因为本期杂志实际上已经“迟到”。我们知道，任何原因都只能是借口，尽力做得更好才是最好的检讨。

言归正传，《外交观察》（第3辑）的主题是“21世纪的新型大国关系”。本期中，美国与俄罗斯两个大国依然是重要研究对象，所涉及的文章包括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中美军事合作、美国应对霸权衰落战略区间设置、俄美关系对中国外交的影响、美日核关系发展等研究，还包括对中苏同盟解体的根源以及俄罗斯与格鲁吉亚关系重启困境的探析。阿富汗局势的未来走向及对中国的影响、中国应对海洋主权争端的政策等，也是本期关注的重要领域。🌐



目 录

新型大国关系：寻求中美关系的长远基础

..... 戴维·M. 兰普顿 / 1

中美军事合作关系：我们如何共舞 安德鲁·斯科贝尔 / 18

解析中国应对海洋主权争端的政策和战略 由 冀 / 31

全面推进的中国周边经济外交 江瑞平 / 51

俄美关系发展演变及其对中国外交环境的影响 刘 军 / 71

利益交换的失衡：中苏同盟解体的根源探析 成晓河 / 87

美日核关系的现状与未来 樊吉社 张金勇 / 110

战略区间设置：美国应对霸权衰落战略选择 潘亚玲 / 128

阿富汗局势的未来走向及对中国的影响 李小鹿 / 151

俄罗斯与格鲁吉亚关系的困境及前景 毕洪业 / 177

2014 年亚太观察 美国亚洲研究局 / 197

新型大国关系： 寻求中美关系的长远基础^{*}

戴维·M. 兰普顿 / 文



导读：本文主要关注近来呼吁构建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理念，并考察两国为追求这种关系采取的具体步骤。

2012年2月，在访问华盛顿期间，习近平呼吁构建“21世纪的新型大国关系”。在过去的一年里，这种模糊但有潜在效用的概念得到了美国领导者们的广泛认同。这一新型关系的核心假设是中美两国之间的重要冲突并非不可避免；冲突一旦发生，对双方和全世界可能都是灾难性的；在关键议题上彻底不合作带来的机会成本也是巨大的。本文认为，以合作为基础的新型大国关系应包括以下特点：①扩大彼此在对方国家建立企业的数量和规模，以创造就业机会；②在各国外交和安全政策领域构建更有效的内部协调机制；③提高双方的危机管理能力；④使双方军事合作和战略对话实现扩大化、纵深化和制度化；⑤在亚洲建立包括两国在内的经济和安全组织，而不是彼此建立排斥对方的机构。

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中美两国领导人应采取以下具体步骤：①彼此鼓励扩大拉动就业的外国直接投资，降低投资壁垒，某种程度上可通过双边投资协定来实现；②反思中美双边对话机制，并分别指派资深官员具体负

* 本文原载于美国亚洲研究局《亚洲政策》2013年第16期，本译文已经获得原刊授权。

责管理双边关系；③推动双边军事合作机制化和扩大化，并在不同层次和不同领域交换意见，以强化战略磋商；④加强各自对关键的第三方因素的管控；⑤避免做出冷落对方国家公民的无端行为。

“新型大国关系”是一个关键而又有益的概念，它是由中国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2012年2月15日于华盛顿演讲时提出的。习近平阐述了自己的想法，他认为这种关系的特点是“相互理解和战略互信”“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互利共赢的合作”以及“加强在国际事务和全球问题上的合作与协调”。随后，在2012年5月于北京召开的中美第四次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和国务委员戴秉国提议讨论共同发展新型大国关系，同月，时任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梁光烈访问华盛顿，也提出了该倡议。2012年6月，在墨西哥举办的二十国集团峰会（G20）上，美国总统贝拉克·奥巴马与胡锦涛主席会面。据报道，中国领导人呼吁两国深化双边对话，寻求互惠合作，妥善处理摩擦以及共同承担全球责任。2012年7月，继任的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和庞汉钊在刊载于外交部网站以及《中国国际战略评论》（*China International Strategy Review*）的文章中详细地阐释了这些议题。在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总理就职以后，后者曾在2013年3月17日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新闻发布会答记者问中提道：“我不认为大国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共同利益常常多于彼此的争端……我们愿与奥巴马政府一道构建新型大国关系。”

随着中国方面的言论不断传出，奥巴马政府也做出积极回应，如2012年3月，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以及据报道所称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同年6月做出了一系列表态。在2013年3月李克强总理讲话的前一周，奥巴马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汤姆·多尼伦

相当详尽地总结了美国政府的总体反应：

我不同意一些历史学家和理论家提出的“崛起国与守成国必然冲突”的假设前提，这一结果不是命中注定的。大国对抗不是一个物理规律，而是由一系列领导人的选择造成的。而另外有些人呼吁遏制，我们也反对这一点。我们可以取得更好的结果，但建立守成国与崛起国之间的新型关系模式是双方——美国与中国——的共同责任。习近平主席与奥巴马总统都赞同这一目标。

在相互依存及中国国力不断增强的时代背景下，华盛顿过去曾敦促北京全面提升两国各自区域和全球角色的愿景，希望能够推进合作。因此，中国这一有意开展新型大国关系对话的倡议是华盛顿应该，也看似确实极受欢迎的发展成果。然而，不出所料的是，迄今为止，两国初步的建议都更关注每一方希望对方做什么，而不是双方都必须做什么。本文旨在详细说明在经济与安全领域中需要展开或进一步推进合作的具体政策建议，以推动讨论的进程。

如今迫切需要具体的思索，因为无论是双边关系还是当下亚洲部分地区的紧张形势，都有着令人担忧的发展态势。在2013年春季经中国党政最高领导层批准通过的《中国国防白皮书》中，明确提到了以下问题。

中国仍面临多元复杂的安全威胁和挑战。有的国家（指美国）深化亚太军事同盟，扩大军事存在，频繁制造地区紧张局势。个别邻国在涉及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上采取使问题复杂化、扩大化的举动，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制造事端。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三股势力”威胁上升……机

械化战争形态向信息化战争形态加速演变，主要国家大力发展军事高新技术，抢占太空、网络空间等国际竞争战略制高点。

在这一时刻，双方必须摆脱历史决定论，重新掌控各自的及共同的命运。在 20 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起支配作用的霸权更迭模式是国际阶级意识形态斗争和冷战思维的结合体。如今，占支配地位的、基于大国冲突必然性的决定论思维面临着知识上和实践上的新挑战。正如 2013 年 1 月一位中国高级代表在谈话中向我提及的那样：“如今存在阻止崛起国和霸权国走向万丈深渊的理念。”

一 大国关系之流变

1. “一山藏二虎”

美国和中国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就已建立了一种新的大国关系，同样的真知灼见要在今天重现。尽管如此，现在与过去有一个巨大的区别，尼克松总统和毛泽东主席，以及卡特总统和高级领导人邓小平建立了大国之间的新关系，但它仍然是传统的旧型关系，这种关系是冷战的产物，实际上是在共同反对第三方——苏联——的背景下建立的。尽管此后发展积极关系的基本含义得到极大的拓展，但这样的关系更多的是关注它们反对的东西，而不是它们共同支持的东西。这是一种在旧的冷战背景下建立的两国新关系。

当前的时代给中美两国领导人提出了一个挑战，就是证明中美两国许多人信奉的那句中国古谚语——“一山不容二虎”——是错误的。理论家约翰·米尔斯海默在其著作《大国政治的悲剧》（*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一书中为这一假设提供了最新且最有说服力的注释。米尔斯海默及其同道认为国际事务中的支配地位等同于安全；一个崛起中的经济大国不可避免地会将其经济实

力转变为军事上的硬实力，以取得支配地位和实现安全；而这些行为不可避免地会使原有的霸权国产生焦虑和反制压力——一种旨在限制、延缓，甚至可能消灭崛起国的实力。因此，在大国关系不断转变的时代，国际体系当中充满着危险，摩擦是不可避免的，且极有可能发生战争。崛起国对霸权国心理上的怀疑或实际上的限制感到不满，甚至会变得不耐烦，而维持现状的国家会变得惶恐不安，从而采取措施以减少可能的挑战。

尽管崛起国和守成国之间的互动是具有挑战性的，甚至是危险的，但米尔斯海默这样的“进攻性现实主义者”提出的处理紧张关系的策略，极少充分考虑获得或维持主导地位（或霸权）时可用的政治和物质资源、这种努力过程中国内实力耗竭的可能性，以及国际体系中其他国家对这一行为的反应。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取得主导地位和霸权的努力可能会耗尽满足国内需求的资源，以至于一方或双方的综合国力的根基不断流失。尽管所用的词汇不同，但这类进攻性现实主义的腔调在美国和中国无处不在。如果两国领导人及其智囊团透过这一理论和策略来观察当今中美关系的特征，并依此作为决策依据，那么对合作的渴望就只能是一种妄想。在美国，大家常常听到有人断言中国的目标是减少美国在亚洲的战略存在；而在中国，人们几乎普遍坚信美国的政策是遏制和延缓中国的发展，阻止中国成为重要的国际角色，挫败中国民族复兴的理想。

然而，客观现实与信念有可能背道而驰。中国在地区和全球性论坛与组织，诸如东亚峰会、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许多双边或多边组织及机构中，都曾与美国携手合作。2011~2012年度，美国已接纳约19.4万名中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两国都是对方重要的贸易伙伴，2011年双边贸易首度突破5000亿美元大关。回顾过去，2008年秋季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及之后的中美合作让人印象深刻。尽管我们不得不承认两国仍存在问

题，部分问题还十分严重，但这些情况与其他事实都不足以支撑以上一国对另一国动机、利益或行为最蹩脚的解读。

这些问题可以简单地归纳如下：美国如何能与中国从当前的互疑转变为稳定且更富有成效的局面？只有相互理解中美两国关系的战略基础以及不断积累适度的、积极的和渐进的步骤，新型大国关系才有望建立。互疑如此深刻地根植于知识分子的理论基础、官僚政治的认识和部门利益，以及大众的焦虑当中。因此，相对于单一的转型计划而言，一系列积极的、渐进的举措将更有可能成为可行的路径。

寻找一种新型大国关系的目的是避免中美两国发生严重的冲突和实现全球体系层面的合作红利。当前的任务是明确制定切实可行的步骤，以使两国朝着这一方向共同前进，其中最重要的是中美两国需要共同承担这个任务，基于一方独立完成或仅仅关注对方路线的缺失的方案都终将失败。

共同的战略出发点必须是中美两国不是也不必再是对手，尽管竞争与分歧将持续存在是十分正常的事情，但是两国通过合作而非挑起争端都能得到更大的收益。共同战略要求的首要任务是，两国需要注重自身国内体制改革和都难以承受因将对方视为对手而带来的痛苦、高昂而不必要的代价。几乎所有的民意调查明确显示，中美两国人民都不希望出现这样的冲突。考虑到全球经济、环境和健康面临的挑战将可能带来对安全问题的关注，其严峻程度不亚于20世纪的传统安全问题，因此合作就显得尤为重要了。这个观点必须更加有力且更让人信服地在两国的利益集团和公众舆论中得到表达。

现在的困境是，安全不再是将中美两国绑在同一战车上的问题（最初体现为共同反对苏联，后来则是打击恐怖主义），而日渐转变为分裂两国的因素。如果彼此能相互理解，则会发现共同安全仍

是两国的核心需求，安全可以通过合作得以促进。在以下的建议当中，我更多地强调对安全和经济合作的传统认识，但全球环境和健康问题也同时提供了关键的合作领域，并对安全和经济关系产生了巨大影响。

2. 当前的机遇期：近来领导层交接的影响

中美两国最近完成了国家领导层的交接工作，也随之迎来了激发新思维的机遇。对北京来说，随着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新的外交政策和领导人已经全部亮相，其中还包括几位对东亚地缘关系，尤其是中美关系有丰富经验的领导者，比如国务委员杨洁篪、外交部长王毅和新任驻美大使崔天凯。毋庸置疑，他们将采取包括习近平主席在内的新一届中国领导人制定的政策方针，而如前所述，习近平主席曾在倡导中美两国新型大国关系过程中扮演过重要的角色。随着交接工作的完成，奥巴马政府通过汤姆·多尼伦的声明向中国传达了强烈而且积极的信号，即美国政府“准备与习近平、李克强等中国高层领导人巩固现有的关系”。

美国方面也发生了重要的人事变动，尽管其全面的影响要随着时间的变化才会变得清晰。更富有经验的新任总统、国防部（现由前任参议员查克·哈格尔领导）和国务院（现由前任参议员约翰·克里领导）领导层的组合可能会重新审视不断发展的亚洲区域情况和中美关系。国务卿克里和国防部长哈格尔都有着丰富的个人经历，也都经历过亚洲 20 世纪 60 年代的动荡岁月。除了对克里和哈格尔有深刻影响的越南经历以外，即使是在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卸任后，人们还可以看到她对紧缩的财政政策和收缩美国在中东、中亚与南亚势力的承诺及利益等外交政策的影响。

关于美国经济和财政预算的现实情况，现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丁·登普西（Martin Dempsey）在 2013 年 3 月 18 日谈及

美国国防战略所受到的影响时说：“我今天站在这里，我仍然不知道我们的国防战略是否发生了变化，或是在多大程度上发生变化，但是我预计它将会变化。我们需要重新审视我们的假设前提，同时我们需要使得我们的意愿与能力相匹配。这意味着我们会做得更少，但做得更好。”我们必须有一些报道的背景下对上述研究进行分析，据报道，国防部长哈格尔下令五角大楼必须重新考虑奥巴马政府2012年提出的全面军事战略，以确认在最近预算削减的情况下国防支出是否还能负担得起。此外，在任职听证会上，候选人克里表示要对中国将美国看做所谓的“亚洲轴心”的情况保持警觉：

中国人看了看，说：“美国在干什么？他们是在试图包围我们吗？发生什么事了？”所以……每一个行动都会引发连锁反应。它不仅仅是物理规律，而且是政治和外交的定律。我想我们不得不思考我们该如何前进的问题。

在2013年2月就任国务卿以后，克里的确坚决支持奥巴马政府提出的“再平衡”政策。然而作为一个概念，“再平衡”存在着许多维度，相对“轴心国”的概念来说比较温和，而且提供了可观的解读空间。

亚洲日益成为对全球经济和安全有重大影响的地区，但与此同时，美国是真正有着全球利益并和包括欧洲在内的地区有着长期重要关系的全球大国。华盛顿必须不断地平衡它在一个区域内的关注点、利益、机遇及其与其他地区的关系。关于怎样才是适当平衡的问题，总是争执不断。例如，副总统拜登曾在2013年2月的欧洲之行期间表示：“简而言之，奥巴马总统和我仍然相信，欧洲是我们与世界其他国家联系的基石，也是我们开展全球合作的催化剂。这是基础，未曾改变。”不管是分开还是综合来看，对这些

言论都不应该做过分的解读；尽管如此，这些言论仍然很重要，并表明了因资源、对抗性竞争、需求转变及突发的机遇所带来的挑战。

现在是国内外可能要求华盛顿给予关注和提供资源的诉求尤为众多的时刻。在国际层面，对于叙利亚的大屠杀、阿以和平进程、伊朗的核发展，以及涉及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彼此间关系的挑战，都需要美国给予关注。那么应该如何分配美国关注能力的权重呢？何况上述例子仅仅覆盖了中东、中亚和南亚。在国内层面，国会与行政当局的僵持已经使得预算遭到大幅削减，从而极大地影响了国防开支。更进一步来说，随着婴儿潮一代人逐渐衰老，社会开支也不断攀升，这还不包括每况愈下的学校质量和破旧的基础设施需要的巨额投资。

坦白地说，在中美两国考虑新关系的同时，我们目前还不清楚奥巴马政府是否有一个战略，既能对世界各地有一个轻重缓急的可持续的排序，又不逾越美国的资源能力；既可以长期支持关键行为体，又符合国内发展需要；既能赢得中国的合作（或避免其过激反应），又能跟上瞬息万变的局势。

二 推动中美关系向前发展的具体步骤

为建立并非以冲突为基础的 21 世纪大国关系，中美两国都必须在一些关键领域采取措施。其中一些举措可以由两国分别独立地完成，但它们必须是并行不悖、相辅相成的。而其他一些措施则需要明确的双边协调或正式的协议。在确认两国应该和可以在哪些领域采取措施的基础上，下文将讨论两国应该如何确定其行动的轻重缓急——这是假设并非所有的措施都是同等紧迫或可行的，而且是鉴于领导能力和物质资源的稀缺性必须做出的必要抉择。

1. 使双方社会紧密相连

考虑到一段关系必须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而基础是要从基层做起的，中美两国应该首先考虑两国地方之间的关系。中美两国地方和中央政治环境中的一个主要现实，就是两国国民最关心的经济和当地实际情况，在很大程度上是指就业。在 20 世纪 80 年代，直到日本开始积极发展与美国地方的关系之后，美日关系才渐趋稳定。这一般是通过日本对推动就业的企业进行投资来实现的，尤其是与美国经济有着广泛联系的汽车行业。同样，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中美关系得到发展的时候也正是美国对华投资增长的时期，这种投资最主要的就是为大量的中国公民提供了就业机会。当前美国对华直接投资仅占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 3% ~ 4%，虽然数额巨大，但比例还不够高。2011 年，美国对华直接投资总额为 605 亿美元，较上一年增长 8.2%。中国对美投资虽然在比例上增长迅猛，但从绝对数额来看还比较小，2012 年仅约 65 亿美元。

如果地方政府领导人及其在首都的代表能看到两国地方福利和双边关系之间的直接联系，他们的言行会更为平衡和温和。据笔者观察所得，如果国会议员所在的地区和州有拉动就业的中国投资，他们在双边关系议题上就会比那些没有这样联系的议员表达和理解得更为中庸一些。例如，在明尼苏达州代表矿业、在肯塔基州代表工具和模具行业、在北加利福尼亚州代表硅谷的国会议员似乎更倾向于营造紧密的中美关系，因为这样有望为他们的选区带来实际的就业福利。我推测同样的机制原理在中国也是适用的。

这一切表明中美两国需要在地方一级增加并巩固两国经济和其他双边相互依赖关系的渠道。这意味着加强两国之间省际、市际，以及企业之间的交流。例如，应该增加中美两国省长与州长之间的会晤，同时也应该增加两国地方商会之间的往来。加强这样的联系是互利共赢的，并且势在必行。